

# 鉴照现实的一面灵活的镜子

## ——浅析《活着之上》的叙事艺术

王洁群, 刘 涛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阎真长篇新作《活着之上》的叙事艺术颇具特色, 其通过对比性、内向性的文本叙事来表现人物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 这样既保证了小说的客观真实性, 又赋予其独特的审美艺术性, 让作品具备了双重审美魅力。

**[关键词]** 阎真; 《活着之上》; 叙事艺术; 对比性叙事; 内向性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6)03-0062-05

### A Flexible Mirror Revealing Reality

#### ——Analyzing the Narrative Art of *Beyond Living*

WANG Jiequn, LIU T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narrative art of Yan Zhen's new novel *Beyond Living* is quite distinctive in that it depicted the living situation and mental state of characters through contrastive and introverted text narration, which ensures the fiction of objective truth, and gives it unique aesthetic artistry, endowing the works with a dual aesthetic charm.

**Key words:** Yan Zhen; *Beyond Living*; narrative art; contrastive narration; introverted narration

湖南作家阎真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 是一部表现当代高校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力作。小说给我们讲述了主人公聂志远从读博士到被评为教授 20 多年间的故事, 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的高校生活成长轨迹。小说中的聂志远是一位有学术追求的高校普通知识分子, 一直以王阳明、曹雪芹等古人为学习楷模, 始终坚守自己的精神操守和人格底线, 遭受不少周折和代价后得以在大学中安身立命。

学者型作家阎真笔下的人物, 既形象又真实。从《沧浪之水》《因为女人》到《活着之上》, 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和方法, 从日常生活小事入手去挖掘人物内心矛盾与困惑, 进而表现人物的生存困境状态, 揭示知识经济时代的问题和病痛。

纵观他的系列小说, 我们可以发现其在专注于刻画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和精神状态。正如作者曾说: “我就是想写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sup>[1]</sup> 其《曾在天涯》呈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异域环境中的精神境遇; 《沧浪之水》关注的是市场经济时代语境下知识分子价值理想迷失的精神困境; 《因为女人》展示的是物质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情感困境和信仰崩溃。最新的长篇小说《活着之上》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仍予以持续的关注和思考, 描述了当代中国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揭示了物质时代高校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列宁曾高度评价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阎真《活着之上》写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对高校文化人进行精神拷问, 同样也是观照中

收稿日期: 2015-08-03

作者简介: 王洁群(1968-), 男, 湖南邵阳人, 湘潭大学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理论; 刘涛(1992-), 男, 湖南衡阳人, 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

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面镜子。

《活着之上》是有着崇高信仰与独立人格精神的普通知识分子的悲剧书写,是对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再现,也是对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大众精神状态的审视。其对于时代精神问题的刻画比以往的作品做得更加深入,更加透彻,更能引发阅读者的深思。阎真的新作《活着之上》选择了对比性和内向性的文本叙事艺术,这两者叙事姿态既表现了作为小说叙述主要内容的人物生存状态,又丰富了文本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这两种倾向的叙事,保证了文学文本的客观真实性,还赋予了作品独特艺术审美魅力和意蕴。小说文本由一定的人文境况来窥探社会与时代的精神脉动,无疑是既有高度又有难度的写作追求。<sup>[2]</sup>其艺术感染力和历史穿透力不仅超越了《教授之死》等一批同类题材小说,甚至超越了其前期已有相当大影响的《沧浪之水》,具有更强烈的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 一 对比性叙事

对比艺术在《活着之上》中大量存在,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成为文本艺术的独特风貌。阎真在作品中将对对比修辞视作一种人物刻画的再现方式和主旨彰显的传达方式。对比性艺术的娴熟使用,反映了作者认识和思考世界的独特视角。通过对对比性叙事,作品让读者体验到在时代语境下知识分子精神困惑的状态,进而经受一次彻底性思想层面的拷问。

对比艺术是一种语言修辞,更是一种文本修辞。这种艺术叙事,不仅使作者笔下的人物形象有“血肉感”,让人物的“在场”近在眼前,使事件发生仿佛就在身边,而且让文本意义和内涵的表达更加自然。笔者认为在《活着之上》中存在四种对比性艺术叙事类型的可能:显性和隐性的对比艺术叙事;历时性和共时性对比艺术叙事。这种具有文本意义的艺术叙事方式,成为《活着之上》作品的独特叙事表达方式,从而在某方面拓展了文本的阐释空间,增添了作品的审美意味和精神内涵。

人物的再现性刻画是小说的重中之重。作品《活着之上》以高校知识分子为主要书写对象,以小人物聂志远为中心,创设了蒙天舒、赵平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作者塑造的这些人物都栩栩如生,给人一种不可多得的熟悉感、亲切感。这一方面当然离不开作者一直坚持写实性的创作原则和手法,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作品人物性格和形象再现

过程中对比艺术文本修辞的运用。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其实一直都在构建作品的人物参照体系,将时间深处“不在场”的历史潮流中的“文人志士”纳入到现存的文本世界中,使过往的“不在场”变成现时的“在场”。聂志远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知识分子,一直自己的人生追求和理想,在一次次面对生活困境时,没有去选择逃避,更没有选择屈服妥协。正因为他坚守着知识者的那份精神人格,他一次又一次经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考验和煎熬。他以曹雪芹、王阳明等传统文化中的巨人为学习楷模,在历史生活轨迹中去寻求偶像力量的支撑,以保护个体自身不被现实世界强制性同一化。无论是在自身求学、工作寻找和职称评定过程中,还是在爱人和同事编制以及学生工作问题上,他的内心渴望给她们“施以援手”,给予最大支持和帮助,但却始终不能放弃那份知识分子的自尊。他宁愿做一个悲情的坚守者,也要在自己的小阵地上坚持下去,同这一时代中的钱和权两大巨型话语进行最后的抗争。他20多年来一直都在苦苦坚守知识分子的那份精神操守,正如同学生的课堂对话:“我们是人,不只是一具肉身,应该为精神价值保留一席之地”。<sup>[3]125</sup>他深知自身的身份是高学历知识者,角色地位注定了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为了“活着”,应该还有更多“之上”的追求。正因为这样的坚持,让他不断地陷入无尽的生存困扰和精神困惑之中。在小说的最后,聂志远再次去西山探访,那块曹雪芹先生曾经生活的土地,完全成为其精神思想的寄托所。他一想起敦诚给曹雪芹的那首诗,就感叹道:“千百年的历史,在教科书中被一页一页轻轻翻过。只有回到时间细微的褶皱之中,才能体验到他人生的寸寸血泪。还有多少同道者被岁月无情地湮没了啊!而且,那些坚守者也没能改变世界,时势比人强。”<sup>[3]308</sup>在此,可以明显地体验到主人公和同道者在面对时代大环境难以改变的所谓“事实”时的那种“心有力而力不足”的无奈和尴尬心境。作者笔下的历史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坚守者,同时性地在文本世界中得以再现刻画,将此两者共同设定出现在“强大无比”的时势面前。笔者认为这是文本叙事的隐性和共时性对比艺术的展现方式,这种叙事艺术使得聂志远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状态在两者对比叙事中得以鲜明地表现出来。

同时,主人公聂志远的价值选择和角色定位,还表现在一系列人物出现和事件发生过程中,这些

叙事对象构成了显性或历时性对比艺术叙事情境。鲁迅先生指出：“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和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忧，所谓‘相反而实相成’者，就是这。”<sup>[4]</sup> 聂志远就是作者心中和笔下的“优良的人物”，正是运用对比性艺术叙事方式，“靠别种人比较，衬托”，从而凸显出知识者聂志远坚守知识分子人格底线和精神操守的可贵性。在这一层面上，同窗好友蒙天舒完完全全被刻画成聂志远的对立面人物。他为人处世一直遵循功利主义原则，信奉那套“屁股中心”定律，凡事都顺顺利利，一毕业就留校工作，考博士也被优先录取，不学无术却成绩突出。破格评教授，拿课题，当院领导等诸多美事，全部都落在他的头上。聂志远为生活奔波辛劳，还在评职称路上苦苦挣扎时，蒙天舒已经掌握了学术圈的些许话语权，成为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蒙的生存哲学就如他所言：“搞到了就搞到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搞到了就是搞到了！”<sup>[3]69</sup> 在他眼中无所谓原则和底线，全部的要义就是要实现目标，要“搞到”。在聂和蒙的这种显性对比艺术叙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站在时势面前的知识分子，由于不同价值选择而造成的不同人物命运的现实。《活着之上》文本叙事的自始至终，蒙天舒都是作为对照、衬托的人物形象而存在，目的在于逼真性地呈现主人公聂志远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思想。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阎真的这种独特的对比性叙事，不仅仅是一种人物刻画的再现方式，更是一种主旨彰显的传达方式。正是在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和各种人物出场的过程中，主人公聂志远的再现性刻画更具真实感和生动感。通过多种对比性艺术文本修辞的不断运用，让历史文人和现世知识者在文本结构中一起“在场”，同时也能将精英文化观、传统文化观、官本位文化观等吸纳进来，丰富文本的文化意蕴。在这一时代语境下，知识分子何去何从成为让人深思和关心的大问题。聂志远依靠来自时间深处“他者”召唤的力量，同现实的权力和市场的巨大话语体系形成的巨大力量做坚守性地抗争。官本位话语、圈子话语作为一种巨大的强制性力量而存在，把人挤压得喘不过气，如文中所写：“我的角色实际上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预设，不可能改变，怎么挣扎也不可能改变。”<sup>[3]279</sup> 作为接受精英文化熏陶过的知识分子——聂志远一直在坚守那超越“活着”之上的精神，他身处传统留存的

景仰式个体精神同现实主导的世俗化集体意识之间所构成巨大的矛盾统一体中，其文本结构显示出强大的反差性力量，这也正是小说“张力”的显性突出表现。在这里，阎真把主人公聂志远面对“局势如此”时的精神世界困惑和无奈心境融入到文本主旨彰显的传达——时代语境中知识分子困惑的精神状态及其何去何从出路的思考。在相对完整统一的文本结构中，扩展了文本艺术的深度和厚度，让读者体验到转型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坚守精神的难能可贵，从而进行自身精神灵魂的自我审视。

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聂志远在时代环境中都以被动的姿态存在，让人觉得欣慰的是——最后也幸运地评为教授，从而获得了时代环境“赠送”的些许话语权。在这之前，为了自己的工作、爱人赵平平的编制以及学生的出路，聂志远反复感慨：“人得活着，好好活着，活着是硬道理，好好活着更是硬道理。”<sup>[3]140</sup> 他在一次次地有意降低知识分子精神层面“居上者”的姿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他日常生活中的“知行不一”看似在要为适应时代环境而去改变自己，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一种池大伟（《沧浪之水》主人公）式的妥协和投降。在文本中，作者还有意设置了一系列人物的出场，例如同事小蒋、学生贺小佳以及职院的高老师等等。正是通过这些隐含性对比细节和情境的安排，《活着之上》向我们呈现了这一时代的知识者聂志远真实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在这里，作者虽是隐藏性地存在，但作者的意图却是十分明显。在《意图谬误》中，威廉·K·维姆萨特给作者意图作这样的定义：“所谓意图就是作者内心的构思或计划。意图同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他的看法，他的动笔的始因等有显著的关联。”<sup>[5]</sup> 作者这种对比性叙事方式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到聂志远的身份地位虽在变化，生活环境也在改变，但唯一没变的还是那颗坚守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心”。作者这样的叙事选择为的是向我们展现知识分子在大环境中的相对完整性和统一性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以对比性叙事作为精神主旨彰显的方式，其作品进而更具思想性、批判性审美魅力。阎真通过这种对比性叙事，使得人物的再现性刻画和情节整体性推进得以完成，而在更高的叙事层面上，则表现为内向性叙事手法的运用。

## 二 内向性叙事

阎真的新作《活着之上》是首届路遥文学奖唯

一获奖长篇小说。笔者认为这部新作获得社会关注和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本内向性叙事的成功运用,是作者为知识分子“写心”的成功实践。在文本世界中,作者将书写对象对准了小说个体人物的内心,准确、真实地向我们呈现了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由此可见,《活着之上》在文本叙事中寻求一种“内向性”,即小说叙事的主要内容是表现人物的内心状态,并以此来构建整个文本的叙事框架。

“内向型”文学一直都有,而阎真的《活着之上》是新时期的独特“内向性”叙事文本。郁达夫就认同并实践着“注重于描写内心的纷争苦闷”,并与“只叙述外面的事件起伏”的创作模式区分开来。<sup>[6]</sup>显然,“内向性”叙事是一种“强调自我”的文本创作艺术,注重的是描写人物的心理、情绪等内心世界的变化活动。《活着之上》讲究小说文本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范例,也是新时期文学创作“向内转”的重要代表。鲁枢元曾对“向内转”做出明确界定,他在文章中写道:“‘向内转’,是对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整体动势的一种描述,指文学创作的审美视角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位移。”<sup>[7]</sup>而这一“内向性”叙事文本,作者阎真和小说叙述对象聂志远同为知识分子,他们身份角色的同一性让文本叙事更自然、更顺畅。在这里,文本成功地将现实生活和“作家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叙述对象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融合起来。现实的“客观”和作者以及叙述对象“主观”实现统一融合,这是小说“内向性”叙事表现出来的独特审美特质。小说在主观和客观相融合的文本叙事结构中,既保证了文学文本的“客观真实性”,又赋予了作品更加丰富的审美内涵。

《活着之上》的这种独特的“内向性”叙事艺术,首先表现在作者着力刻画文本世界中的人物内心状态,特别是知识分子聂志远在时势面前的那种尴尬和无奈的精神心境的细致地再现。小说向我们叙述了聂志远 20 多年的高校生活故事,他自始至终都在坚守先知们的高尚精神和人格,在自己的那块小阵地去同时代话语力量作抗争。他固守着“人活着不只是为了活着本身,还要为了活着之外的什么而活着”的生活信念,并相信心中的“文化英雄”一直会坚挺性存在。但是当真正步入知识经济社会时,以知识分子“精神高贵”为自豪的他产生了精神困惑,遭受前所未有的强制性“压迫”。诚如作

品中所写的那种恐慌:“难道,这么多年来,自己珍视的那些东西,都只是一种其实并不存在的虚幻?”<sup>[3]223</sup>这是他精神世界陷入极度痛苦、挣扎状态的真实写照:坚守还是放弃,这是值得思考的大问题。小说的最后,主人公聂志远不管身处何境,发生何事,还是坚强地守护着自己的小阵地,坚守好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当然,这样的结局虽有点过于理想化,但这让人欣慰,让人为之叫好。对于身处这一时代语境中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阎真在小说中花了不少笔墨去刻画,真实性地展现了聂志远的精神困惑和思想挣扎,凸显出知识“市场化”“经济化”时代中知识分子坚守精神的意义和价值。其叙述视角由外部客观世界转向个体人物的内心,这无疑增添了小说文本的艺术审美魅力和意蕴。

叙事的“内向性”还在追求一种客观真实性,保持同现实主义小说相一致的特征——注重客观再现。小说把文本叙事的真实性原则看作艺术的生命,在某种意义上看是达到了另一种“真实”。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追求的真实性来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性格”“客观再现现实生活”等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的具体运用。但在《活着之上》中,阎真将外在现实生活的客观和作家、叙述对象的内在主观相融合。这样既客观真诚地反映生活现实,又真实刻画出每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身处尴尬境地的那种精神状态,从而细致而合理地表现出这一时代知识者的精神世界。恰如阎真自己所言:“我是小说当作‘历史’来写的,从宏观的时代氛围到微观的心灵波动,我以‘真实’为准则加以描写。”<sup>[1]</sup>我们解读阎真的创作“真实观”可以得知:其一是把小说作为一种“历史”来布局构思文本叙事,要写出时代环境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要对得起“历史”;其二是小说要真实性描写时代话语背后个体人物的心理现实。在此,小说叙事在时代环境和个体心灵的真实再现性描写的合力作用推动下,促使文本达到最大化的“真实性”。因此,《活着之上》通过这种内向性叙事艺术,让人物和场面的出现更符合现实生活逻辑,这是小说纪实感和现实感的完美展现。

很明显,内向型艺术注重的是作者个人化情感的抒发和表达,正如威廉·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1800 年版序言所说:“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sup>[8]</sup>内向型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在这一艺术特质方面保持同一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文

本的叙述对象就是作者的传声筒和代言人,叙述者完全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影像,所以在叙事情感层面上会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激情特征。但《活着之上》并非如此,在运用内向性文本叙事手法去布置文章结构时,始终会让外界的作者保持“说话者”的姿态,遵守作家在艺术活动中的“工作制度”——“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中露面一样”。<sup>[9]</sup>这样的作者就成为所谓的“缺席的叙述者”,即最大程度的隐蔽叙述者或非个人化的叙述者,<sup>[10]</sup>从而客观冷静地向我们述说主人公聂志远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成长生活经历,精微细致地描绘出知识分子在时代语境中的那种痛苦挣扎的精神状态。《活着之上》的内向性叙事艺术的运用,没有允许作者“在作品中露面”,而是让外界的作者保持客观冷静的叙述姿态,由文本叙事自身去进行叙事。在小说客观真实的文本叙事情境下,读者会不得不去深入思考和关注当今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状态,并且去审视反思知识分子同社会时代的关系问题。这促使小说的“文本世界”既具有客观真实性的审美特质,又具有反思批判性的审美意味。

同时,小说《活着之上》的这种“内向性”文本叙事艺术,避免了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学“向内转”问题:“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向内转’陷于不可克服的片面性,它恰恰遮蔽了文学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sup>[11]</sup>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该小说叙事的独特性所在:既保证了文本本身的艺术性,又避免了叙事“向内转”与现实脱节的问题。同客观现实生活的有效对接,确保了文本叙事的客观真实性。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第一人称的抒情和议论,让文本的情节和人物的真实感得以增强。由于外界的作者和文本中叙述对象身份的高度一致性,外在的客观和内在的主观相融合,使得文本叙事能把人物内心世界描绘得更加细致生动化,进而窥探到知识分子的真正精神世界和心理空间。在《活着之上》中,主人公和作者本人的个人身份和时代环境的高度叠合,使得小说主人公的议论和抒情,好像是作者自己在直接宣泄个人化的情绪:“知识分子是没能改变世界的,好好活着,就是最有意义的事,一切与此无关的问题都不必上心……知识分子的学问是在于外面‘跑’,而不是在书房‘写’。人这一生是渺小而珍贵的,活着才是真正的硬道

理。”<sup>[3]</sup><sup>67</sup>笔者认为这些并不是作者的“违规行为”,反而正是由于作者本人和叙事者身份和环境的重叠性,才有可能将客观和主观相融合,去做到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相对接。这样的叙事表达方式,大大增强小说文本叙事的力度和深度,让小说《活着之上》的艺术性和真实性的审美特质得以最大化展现。

总的来说,阎真通过“对比性”和“内向性”这两种文本叙事姿态,既表现了时代语境中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又丰富了小说文本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活着之上》真实性地展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者聂志远的精神困惑,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和关注这一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和精神状态,去审视反思知识分子和社会时代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说,这两种叙事姿态的运用,不仅保证了文学文本的客观真实性,而且赋予了作品独特的审美意味,进而让《活着之上》在新的层面呈现出双重审美魅力。

#### 参考文献:

- [1] 阎真,赵树勤,龙其林.还原知识分子的精神原生态:阎真长篇小说创作访谈[J].南方文坛,2009(4):63.
- [2] 白焯.中国文情报告(2014-2015)[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5:22.
- [3] 阎真.活着之上[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
- [4] 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82.
- [5] 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上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95.
- [6]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7.
- [7] 鲁枢元.“向内转”[J].南方文坛,1999(3):5.
- [8] 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3.
- [9]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10.
- [10] PRICE G.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M]. Nebraska: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8:1.
- [11] 白亮.“向内转”与八十年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再认识[J].当代文坛,2008(3):48.

责任编辑:黄声波